

红色文化
延安记忆

王纪刚◎编著

延安大学校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王纪刚◎编著

延安大学校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西安 北京 上海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延安大学校/王纪刚编著. —西安: 世界图书出版
西安有限公司, 2016. 2

ISBN 978-7-5192-0697-0

I. ①延… II. ①王… III. ①学校—介绍—延安
市—现代 IV. ①G527. 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08948号

延安大学校

编 著	王纪刚
责任编辑	赵亚强 雷 丹
校 对	刘 青 王 冰 邓碧琳 郭 茹
视觉设计	诗风文化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
地 址	西安市北大街85号
邮 编	710003
电 话	029-87214941 87233647 (市场营销部) 029-87235105 (总编室)
传 真	029-8727967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金德佳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40mm×170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2-0697-0
定 价	38.00元

☆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本公司更换☆

《红色文化·延安记忆》丛书

序 言

有一个地方，地处西北荒原，条件艰苦，交通不便，却如同磁石一样吸引和召唤着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各方人士、青年学生、爱国侨胞纷至沓来。她以不可思议的“魔力”感染甚至动员了来自国内外的记者、民主人士、军政官员，有人感叹：我要是在这里继续待下去，可能也会变成一名共产主义者，而有的人则义无反顾地留在这儿一起战斗，甚至在抗战前线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有一个地方，从来是作为精神的家园，灵魂的圣地，给了无数生长于斯、生活于斯、战斗于斯的人们巨大的精神动力和情感寄托，令他们牵肠挂肚、难以忘怀；也令更多的人心怀崇敬，真诚向往……

这个地方，就是——延安！

“深厚坚实的黄土，傍城东流的延河，嘉陵山上高耸入云的古宝塔，以及那一层层、一排排错落有序的窑洞，这里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特别是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们看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我被深深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

——说这段话的，是著名摄影家吴印咸。他刚来延安时，只是应邀拍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并且是抱着拍完片子就回上海的态度。在延安，他享受着共产党人对外来知识分子的特殊礼遇：每个月120元的生活津贴。须知，当时作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朱德每月也就只有5块钱。一年多后，片子拍摄即将结束，时年40岁的吴印咸毅然做出了留在延安的决定，参加八路军！并按照八路军的标准拿着每月1块钱的津贴。^①

作为第一个来到陕北采访的外国记者，美国人斯诺回顾自己四个月的采访，“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如此强烈的感受。”^②

不光是斯诺，后来带着“谁，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疑问的不少外国记者、外国政要、外军将官，也都在与延安接触之后，不约而同地主动发声，向外界表达自己对延安的由衷敬意。用美国记者爱泼斯坦的话来说：现在我能够做的，就是将我所知道的告诉全世界人民。^③

而那些在延安长期生活的人，对延安的体会尤为深刻：

在延安，真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不管你学问多少，本事大小，总能找到你能干的工作，发挥你的长处。随着形势变化，工作岗位也经常变化。今天你当班长，说不定过几天就让你当连长；今天你领导他，不久他又领导你；变来变去倒把人变聪明了。懂得了岗位的变化，职务升降，都是形势需要、工作需要，一般人很少计较。而且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往往发展得比计较

① 吴筑清、张岱：《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4页。

② [美]埃德加·斯诺著，宋久、柯南、克雄、新民、董乐山译：《斯诺文集1：复始之旅》，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12、213页。

③ [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把真理告诉全世界》，齐文编译《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上海：历史资料供应社，1946年，第140页。

得失的人更好。延安人在这方面受到的教育，是终身受用的。^①

——这是先后在延安抗大、马列学院等学校学习，后来长期在延安工作的王仲方的肺腑之言。

难怪有人感慨：在延安，物质生活虽然简朴、艰苦，工作与劳动虽紧张，但精神上的愉快，是生活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人都不可能体会到的。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了李白的佳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② 并由衷夸赞：延安的水是甜的，延安的小米是香的，延安的人是亲的。^③

历史，是最客观的存在。

历史，值得记录，更值得记忆。

延安所体现的无处不在的红色记忆，在新时代的今天，尤其值得珍视。

更不用说，红色中国正是从这里一步步稳健地走来。

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 and 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延安时期的十三年，是我们党以及中国革命不断发展、成熟、壮大的十三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取得杰出成就的十三年。深入挖掘延安十三年的红色文化，传承延安记忆中的红色基因，对于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弘扬革命传统，意义重大而紧迫。

这套《红色文化·延安记忆》丛书，从广大的普通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需求为出发点，以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伟大实践为蓝本，以权威文献资料

① 王仲方：《延安风情画——一个“三八式”老人的情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第103页。

② 古达：《童年在故乡》，孙新元、尚德周编：《延安岁月》，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79页。

③ 罗文浩：《我五次进出延安的经过》，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忆延安》（西安文史资料第17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87页。

和延安时期代表人物的作品、回忆录等为文献依托，以客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为叙述对象，以平实朴素、鲜活传神的叙述视角和语言风格，采取图文并茂的方式，从延安时期的社会风尚、学校教育、文化活动、新闻宣传、经典事件、典型人物等不同角度，系统解读和梳理延安时期的壮阔历史。以大历史感知新时代，用小故事生发精气神，于客观描述与情景再现中，展现延安时期积极向上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精神。

历史，不单单是已经发生了的史实，也包括正在发生的事情。无疑，我们现在对历史的解读，在若干年后也同样会成为历史。正因此，我们要善待历史，敬畏历史。对红色延安的历史解读，同样如此，甚至更应如此。

只有真正让历史说话，才能使红色记忆永存。

编写中，我们参考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历史文献，对引用的文献资料一般都进行了标注，限于行文体例及阅读便利，个别引文或引述没有标出，而以“参考文献”的形式附于文后；同时采用了由延安电影团、来延安采访的中外记者、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等拍摄的历史照片，以及相关图书、出版物、网站上的照片资料，在此一并说明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延安大学校（代序）

1937年1月，中共中央刚刚进驻延安时，被毛泽东幽默地称为“大城市”的延安，还只是一个位于“三山夹两川”^①狭长地段的西北一隅的小城：整个城市只有一条长约两三里的街道，城区人口不过3000人；四围的古城墙之内，所谓的商店或饭馆也仅有那么四五家。

而伴随着中共中央来到延安的，除党政军各类人员外，还有中共中央党校以及进驻延安时刚刚更名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紧接着，在这块黄土高坡上，就冒出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高等院校和干部院校，以及鲁迅师范、延安中学、延安抗小、延安保育院、洛杉矶托儿所等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在内的数十所学校，遍布在延安的临街沿道、山山峁峁。用毛泽东的话说，延安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大学校”！

曾几何时，这片土地上还是一片文化的荒漠。

据统计，陕甘宁边区建立前，全地区的小学校总共不过120所，学生也只有2000余人，一般县份百人中难得找到一两个识字的人，文盲占到人口90%以上。而在华池、盐池等县，两百人中才能找到一个识字者。1939年，对边区在职干部的统计中，小学文化程度以下者占86.86%，而完全不识字的干部比例达41.26%。1940年，对安塞县干部的一项统计发现，该县7个区长中有4个是文盲，7个妇联会主任则全是文盲。

^① 即指三山鼎峙的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亦称“西山”，古城延安依西山而建）。两川指延河流经的西北川和南河之川。延河由西北川流经古城延安，在宝塔山下与南川流过来的南河汇集转向东流汇入黄河。

对于一贯重视教育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尽快提高各级干部、战士、边区老百姓，特别是适龄儿童的文化水平，培养一大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急需的干部和业务骨干，并通过举办各类学校吸引和培养来自全国乃至海内外的爱国青年，就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1937年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要》等文件中，均对文化教育工作做了重点部署，此后中共中央又陆续出台了《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等具体规定，还专门成立中央干部教育部，优化、整合并有效指导各类教育机构和培训资源，大规模、大范围地通过开办学校来培养抗战干部，提高全体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文化水平。

延安各类高等院校和干部院校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起来。

曾是抗大学员的王仲方在其作品《延安风情画》中，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场景：毛泽东经常在清凉山下陕北公学的一块大场子上，摆上一个小桌子，面对抗大、陕公、鲁艺新到的学生，讲演抗日战争的形势——为什么抗战只能是持久战，为什么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讲话，妙语横生，再大的政治道理，都能讲得深入浅出。在露天广场上，大家席地而坐，不仅不觉得累，而且很投入，听到有趣的话就哈哈大笑。毛泽东也随着大家一起笑。讲者听者，台上台下，一片和谐与欢乐的气氛。讲演结束，毛泽东意犹未尽，他本来是从城里骑马而来，这时也不骑马了，徒步回去，同围着他的一群学生边走边说，谈笑风生。^①

这样的画面在延安时期比比皆是。美国著名记者、时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记者史沫特莱描述毛泽东在抗大和陕北公学上课的情形时提到，毛泽东的课堂和他的谈话一样，都是以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丰富历史为依据。涌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习惯于从苏、德等国的少数作家的作品中吸取精神养料，

① 王仲方：《延安风情画——一个“三八式”老人的情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第8页。

毛泽东则习惯于对学生讲自己的祖国、人民、民族的历史和大众文艺。

不仅是毛泽东，当时的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到延安开会的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以及范文澜、茅盾、艾思奇等大家、学者都是延安学校讲台上的常客。在延安，不同学校的学生相互来听课是一种常态。鲁艺的课堂，听讲者不仅包括鲁艺自己所在学校不同专业的学生与老师，还包括了延安其他单位的听讲者。比如周立波讲《名著选读》课，教室内坐不下那么多人，后来索性就把课堂改到外边的篮球场，大家围坐在一起共同听讲。

然而，延安时期办学条件的艰苦也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

抗大第一期没有校舍，只有几孔破石窟，几块砖头凑成的四方形台子便是学生们在课堂上听讲的座位，学生们自己的两个膝盖，也就成为他们记笔记时唯一的活动书桌。抗大第三期开学时，住宿的地方不足。全校师生硬是在新学员进校之前，15天内自己动手挖了175孔窑洞，解决了近千名学生的住宿问题，还在半山腰修建了3000米长的“抗大公路”。教材、讲义不够或者没有时，学生们就自己抄。纸是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研制的马兰纸，学生们要自己从山上砍下马兰草再送到造纸厂兑换。没有钢笔，就把笔尖捆在高粱杆上；没有墨水，就用颜料水蘸着写。晚上学习没有煤油灯，只有用蓖麻油点的小油壶，五六个学生围在一起做作业。

所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时说，陕公是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们不在乎是否能像其他学校那样照着书本一章一章地来上课，而在乎的是学习一种作风，一种方向。他还与抗大的学员交流：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你们在这里学习的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学不到很多的东西，不像别的大学可以学几十年，但你们可以学一样东西，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学一个宗旨，这个宗旨也就是全国的、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

而当时的延安学校，也具备着一些共同的特征：

一是教育工作密切为抗日战争服务，所有的学校都实施国防教育，教学内容也紧密结合斗争实际；二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生参加实际工作，参加群

众工作，参加生产劳动；三是教学采取讲授、自学、讨论、辅导、个别帮助等方式，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四是实行民主生活，学生选派代表参加学校管理；五是师生关系平等，师生打成一片，共同参加生产劳动，互相学习提高。^①

鲁艺学员古达，曾求学于杭州艺专，通过沈钧儒先生的介绍最初报考了延安抗大。他在被录取后从西安步行去延安，在路上兴奋地与同行的五六位同伴大声唱着歌向延安进发。数日后，当他们望见延安城南门的城楼时，情不自禁地齐声欢呼，然后加快步伐，奔进城里。古达后来回忆：走在颇为宽阔的街路上，我们内心的喜悦之情，比虔诚的基督徒朝拜耶路撒冷时的神圣感都更强烈。因为我们是走向一个新天地，从这里我们要开创一个新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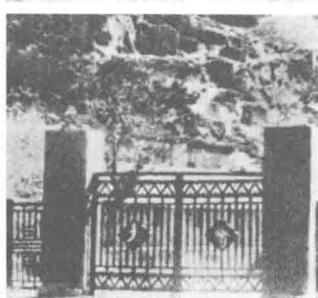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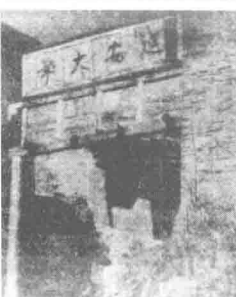
延安学校无疑就是这样一个新天地、新世界！如果围绕延安时期的所有学校进行介绍，自然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也必将是厚厚的若干册书。但作为一本小册子，本书重点围绕部分办学地点在延安的高等学校、干部院校及其他学校（包括华北联大，虽然后来办学地点不在延安，但却是由延安的几所学校组建并从延安出发，也是我们党在延安创办的有代表性的学校），对它们的办学情况进行介绍，使大家在相对从容的翻阅中，对延安大学校的盛况能够管中窥豹，有所感受。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阅读，走进作为革命熔炉的延安红色学校吧！

^① 陈元晖：《老解放区教育简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90页。

- ◆ 003 | 中共中央党校
- ◆ 015 | 马列学院
- ◆ 024 | 军委通信学校
- ◆ 030 |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 ◆ 045 | 陕北公学
- ◆ 062 | 鲁迅艺术文学院
- ◆ 077 | 安吴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
- ◆ 090 | 泽东青年干部学校
- ◆ 097 | 工人学校
- ◆ 104 | 华北联合大学
- ◆ 112 | 中国女子大学
- ◆ 124 | 延安大学
- ◆ 132 | 行政学院
- ◆ 137 | 自然科学学院
- ◆ 154 | 新文字干部学校
- ◆ 161 | 延安民族学院
- ◆ 168 | 中国医科大学
- ◆ 174 | 荣誉军人学校
- ◆ 179 | 延安炮兵学校
- ◆ 187 | 鲁迅师范

- ◆ 195 | 延安中学
- ◆ 202 | 延安保小
- ◆ 208 |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 ◆ 218 | 附录一 毛泽东：干部教育；学习运动
- ◆ 220 | 附录二 李维汉：延安干部学校教育的三阶段
- ◆ 223 | 附录三 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关于延大、自然科学学院等精简问题的决议
- ◆ 225 | 附录四 延安学校名录
- ◆ 228 |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党校

中共中央党校（简称“中央党校”），是中共中央主办的专门负责培训中国共产党高级、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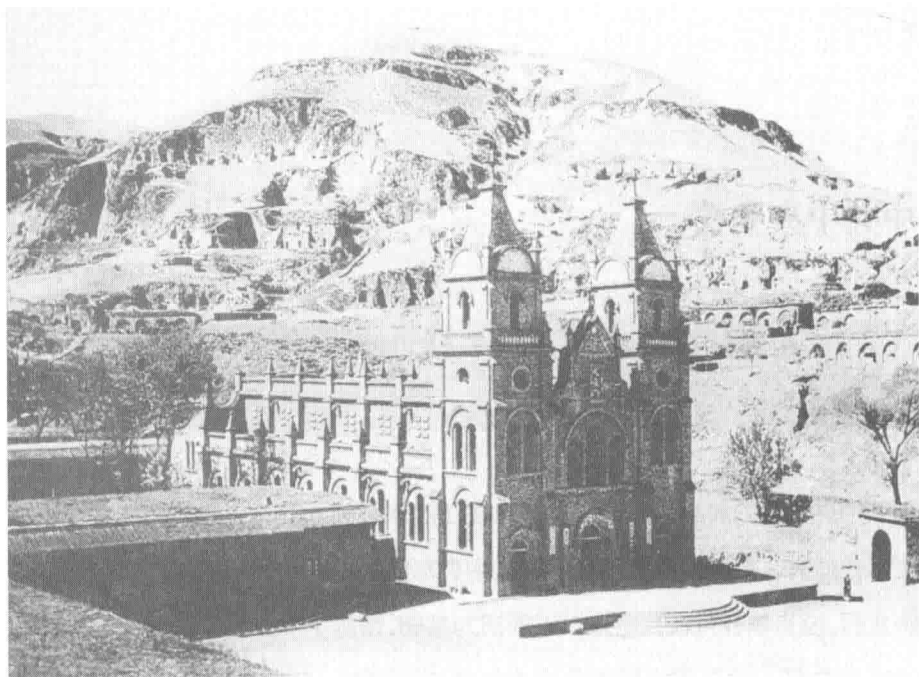
中央党校的前身，是1933年3月在江西瑞金创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红军长征时，该校教员和学员都编入中央军委第二纵队的干部团。中央红军到陕北后，1935年11月在瓦窑堡以干部团为基础，恢复了中央党校，董必武任校长。1936年7月，中央党校随中共中央机关迁驻保安，1937年1月又随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校址在延安东郊桥儿沟天主教堂旧址内^①，1939年2月迁驻延安北郊小沟坪。

时任中央党校校长李维汉回忆道：

刚到延安时，中央党校编为十五个班：一、二、三班主要是红四方面军干部；四班是陕北干部；五、六班主要是老干部、高级干部；七班是少数民族班；八班是抗大四大队转来的党员；九、十、十一班主要是白区学运干部和一些失掉党组织关系的干部；十二、十三班是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干部；十四班是工农、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②

^① 曾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白云峰回忆，桥儿沟天主堂在延安以东飞机场的东边，离城十多华里，当时延河没桥，以木船摆渡。校舍全是教堂的砖窑洞，后来才打了些土窑洞。教室里没有一张桌凳，讲台是泥巴做的，学员坐的全是石头，以膝盖当课桌。上大课、听报告、开大会有时在教堂大厅，有时在露天。我们的宿舍、自习室、小组会场都在同一窑洞里。白云峰：《从北平到延安》，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忆延安》（西安文史资料第17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12页。

^②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298页。



位于延安东郊桥儿沟
天主教堂的中共中央党校
旧址

抗战爆发后，党员的人数迅速增多，中央党校的规模也随之扩大了。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中央党校进行了一次人事大调整。李维汉调任陕北公学副校长，康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受共产国际派遣，随王明于1937年11月29日回国）接任中央党校校长，刘芝明接任教务主任，方仲如为校务部部长。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的工作来抓。为了统一领导中央直属各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1938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干部学校的教育方针问题。会议决定由陈云任中央党校校长，柯庆施任副校长（1938年12月至1939